

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 以刘为民就中美稀土贸易摩擦答记者问为例

吴鹏 朱密

摘要

本文借助语用论辩学的研究框架，从论辩角度分析和评价了外交部前发言人刘为民对中美稀土贸易摩擦问题的应答，以此探讨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路径。该路径由论辩话语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评价三个有机相连的研究环节组成。研究结果显示，为在合理性范围内使论辩结果对自己更为有利，刘为民在其应答的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四个批判性讨论阶段均实施了策略操控。这些策略操控突出体现于刘为民在界定意见分歧、选取共同出发点、设计论证组成以及明确结论时对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方式三个方面的运筹帷幄。对照语用论辩学中的批判性讨论规则，结合中美稀土贸易摩擦的相关案件背景可以发现，刘为民对征兆型和因果型论证图式的把握尚有一定不足。个案分析表明，对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分析和评价必须有机融合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两个理论视角。

关键词

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论辩话语、语用论辩学、策略操控

作者简介

吴鹏，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话语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导。电邮：rocwupeng@126.com。

朱密，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电邮：619625827@qq.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美贸易摩擦论辩话语研究”（14CYY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 Research on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Argumentative Replie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s: Take Liu Weimin's reply about the Sino-US tombarthite trade friction as case stud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Pragma-Dialec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Foreign Ministry's former spokesperson Liu Weimin's reply to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Sino-US tombarthite trade friction.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we intend to develop a pragma-dialectical study approach to the spokesperson's replie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s of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It is comprised of three interrelated parts: re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on, analysi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Our research disclosed that Liu exerts strategy maneuvering all through the four period of critical discussion in order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dialectical reasonableness and rhetorical effectiveness, Liu's strategic maneuvering is reflected prominently in his proper manipulation of potential topic, audience demand and means of presentation in redefining the disagreement, selecting common points, designing the demonstration and reaching conclusion. Comparing with the regulation of critical discussion in pragama-dialectics, take the Sino-US tombarthite trade friction as background, we found that Liu Weimin's manipulation on argumentative replies stills exists weakness. Our study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spokesperson still need to integrate both on dialectical and rhetoric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Pragma-Dialectics, strategic maneuvering

Authors

Wu Peng is the doctor of Leiden University in Holland and the master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su University.

Zhu Mi is the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su University. Email: rocwupeng@126.com

一、引言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中国政府发布外交活动信息、阐明中国内外政策与立场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外媒报道和评论中国内政外交的一个重要信息源。在记者会上，针对现场国外记者提出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尖锐敏感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的应答既要站稳国家立场，还要将国家立场最大程度地合理化，维护中国政府的理性形象和国际公信力。正是由于外交部发言人应答的重要性和显而易见的难度，近年来相关研究日益增多。总的看来，当前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发言人应答中出现的规避、闪避、拒绝、委婉、模糊、礼貌等典型语用现象及其语用功能（胡庚申，王静，2001；涂光晋，宫贺，2009；熊永红，彭晓妹，2009；窦卫霖，2011：97-110；洪岗，陈乾峰，2011；官科，2013等）。这些研究突破了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传统传播学研究路径，将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语言学研究提上了研究日程，丰

富了我们对发言人应答语言特征的理解。但细观之下,这些研究也存在两点明显不足:第一,忽视了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论辩说服功能;第二,分析对象主要是应答话语中的个别字词或句子,缺乏更为宏观的整体分析。这两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应答的主要目的是劝服国际受众接受中国政府在记者所提问题上的立场。为此,发言人通常会充分考虑国际受众对此立场存在的质疑或反对意见,并针对这些意见进行反驳或澄清。从这点来看,论辩性是发言人应答的重要属性。如果我们的研究旨在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应答提供实际启示,就不能仅着眼于其中个别字、词、句所折射出的语言或语用特征(虽然这些研究也很重要),而应从论辩的角度全面分析和评价发言人的应答话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真正能为发言人所用的论辩策略。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如何借助语用论辩学(Pragma-Dialectics)(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1984; van Eemeren, 2010)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将首先介绍论辩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框架,然后以外交部前发言人刘为民在2012年3月13日记者会上对中美稀土贸易摩擦问题的回应为例,探讨这一研究框架在发言人应答话语研究中的实际应用。

二、论辩话语的语用论辩研究框架

语用论辩学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当代西方论辩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在该学说中,论辩被视作话语主体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展开的批判性讨论,其目的是合理消除双方意见分歧(van Eemeren et al., 2011)。究其词源,“语用”指的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描述论辩者为消除意见分歧而在批判性讨论中实施的言语行为,“论辩”指的是沿袭西方古典论辩学传统,依照批判性讨论规则来评判这些言语行为的合理性。语用论辩学框架下的论辩话语研究主要由三个有机相连的环节组成:论辩话语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评价(吴鹏、熊明辉, 2015)。

(一) 抽丝: 论辩话语重构

语用论辩学认为,既然论辩目的是合理消除意见分歧,那么论辩话语研究就应该主要关注其中与消除意见分歧相关的言语行为,即“论辩话步”(argumentative move)。为从“凌乱”的非论辩性言语行为(如问候、漫骂、侮辱等)中“抽”出这些论辩话步,研究者必须对论辩话语进行适当重构(van Eemeren & Houtlosser, 2004:95),这是对其深入分析与评价的基础。重构参照的是一个能够合理消除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该模型由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四个批判性讨论

阶段组成：在冲突阶段，论辩双方明确意见分歧及各自立场；在开始阶段，论辩双方明确正、反角色（正方承担举证责任）并确定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在论辩阶段，正方提出一个或多个论证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反方则质疑或反对正方立场与论证；在结束阶段，论辩双方明确意见分歧是否被消除（van Eemeren et al., 2002: 25）。虽然现实论辩一般并不按这四个阶段依次展开，顺序上可能会出现跨越或反复，但任何一个意图（或表面上意图）合理解决意见分歧的论辩者通常都会以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的话步完成不同阶段的核心任务，这就是对论辩话语进行重构的线索或依据。具体而言，研究者可以首先结合语境和文本确定论辩者试图消除的意见分歧；然后，按照是否与消除意见分歧有关（即与完成不同讨论阶段的任务有关）这一标准去除其话语中的无关表达、添补隐含表达、替换含混表达；最后，根据理想模型重排相关表达，再现论辩话语中隐含的四个讨论阶段，并明确其中的立场、正反双方、出发点、论辩结构¹、论证图式（argument scheme）²和结论等核心论辩要素以及承载这些核心要素的论辩话步。

（二）入微：策略操控分析

论辩话语重构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论辩者意图合理消除意见分歧。但在现实论辩话语中，“合理”只是论辩话语受众看到的“外衣”，外衣之下是论辩者对“有效”的不懈追求——使每个阶段的批判性讨论都有利于维护自己立场。为调适合理和有效之间的潜在张力，论辩者会根据具体情形持续调整自己的论辩话步。语用论辩学将论辩者的这种持续性努力称为“策略操控”（strategic maneuvering）（van Eemeren, 2010: 40-41）。不同讨论阶段的策略操控各有其特点和目标，但它们基本都体现了论辩者在“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方面的运筹帷幄。其中，“潜在话题”指的是在不同阶段对话题或视角的选取；“受众需求”指的是迎合受众普遍持有的观点、偏好或价值取向；“表达手段”指的是对句式、词汇、辞格等语言形式的选择（van Eemeren, 2010: 93）。

语用论辩学认为，在分析某个讨论阶段的策略操控时，研究者一方面要分析该阶段论辩话步在潜在话题、受众需求和表达手段三方面的综合选择，另一方面可以从四个维度阐释这种综合选择的策略功能：（1）结果——揭示该阶段论辩话步对讨论结果的影响，如形成了怎样的意见分歧和立场、确定了怎样的出发点、组建了怎样的论辩结构或明确了怎样的结论等等；（2）路径——分析论辩者在该阶段论辩话步上的若干可能选择以及不同走向，以此呈现该话步实现上述结果的具体路径；（3）制约——通过对论辩所属交际活动类型及其特征的剖析揭示机构语境

对实施该话步的制约或为实施该话步提供的可能；（4）承诺——剖析论辩双方在该话步发生时业已达成的承诺，以此揭示影响该话步的即时情景（van Eemeren, 2010: 163-165）。

（三）慎思：批判性评价

论辩话语重构可以辨明论辩者为合理消除意见分歧而采取的论辩话步，策略操控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这些话步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取舍。但这些话步是否有助于合理消除意见分歧还有待批判性评价。在语用论辩学中，批判性评价主要考察论辩话步是否违反了十条批判性讨论规则：（1）自由规则——不得阻止对方自由提出立场，也不能阻止对方质疑自己的立场；（2）举证责任规则——提出立场的一方有义务对方要求为己方立场辩护；（3）立场规则——对另一方立场的攻击必须与另一方确实提出的立场相关；（4）相关规则——只有提出与立场相关的论证时，该立场才得以维护；（5）未表达前提规则——不得错误地将另一方未表达的事物认作前提，也不能否认对方的未表达前提；（6）出发点规则——不能错误地把前提当做共同出发点，也不能否认作为共同出发点的前提；（7）论证图式规则——如果对立场的维护没有借助正确的论证图式，或者没有恰当使用论证图式，那么就不能认为该立场得到了决定性维护；（8）有效性规则——论辩中的推理必须逻辑上有效；（9）结束规则——维护立场失败必须收回其立场，若维护成功则对方必须收回质疑或反对立场；（10）语言使用规则——不得使用不清楚的表达，且必须正确解释对方表达（van Eemeren, 2004: 190-196）。这十条规则实际上体现了理性论辩的两个核心原则：问题有效性原则（有助于意见分歧的合理解决）和主体间性原则（论辩双方都能接受）。虽然遵守这些规则并不能保证意见分歧能够最终得以消除，但违反它们就会导致论辩脱离合理性的轨道，最终滑向谬误。

三、个案：刘为民就中美稀土贸易摩擦答记者问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稀土资源国，也是稀土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长期以来，全球市场主要依赖中国出口稀土，中国稀土储量已从世界储量的90%下降到36%，而产量则仍占全球产量的90%左右。稀土储量世界第二的美国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每年从中国大量进口（李朝辉，2012）。由于稀土生产和加工过程对环境破坏巨大，加上国内稀土开发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的严重后果，2009年稀土被中国列为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货物，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2012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已联合欧盟和日本向WTO提起磋商请求，认定中国对稀

土等原材料实施了不公平的出口管制。

同日，在中国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道：“有报道称，中方限制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的出口损害了美企利益，美方将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作出投诉。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时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为民对此问题作了如下应答：

“①稀土是一种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稀土对环境造成影响，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考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稀土的开采、生产和出口各个环节均实施了管理措施，而不仅仅在出口环节，相关措施符合世贸规则。②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③多年来，尽管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中国一直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④今后，中国将继续向国际市场供应稀土，并依据世贸规则对稀土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⑤中方希望其他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也积极开发稀土资源，共同承担全球稀土供应的责任，也愿意在寻找开发稀土的替代资源、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³

基于语用论辩学对论辩和论辩话语研究的理解，本文对刘为民上述应答的分析与评价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刘为民的应答试图解决什么意见分歧？立场是什么？他是如何维护自己立场的？（2）刘为民是如何在其应答中实施策略操控的？这些策略操控有何功能？（3）刘为民应答话语中是否存在谬误？

四、刘为民应答话语的语用论辩分析与评价

（一）应答话语的论辩重构

1. 冲突阶段：意见分歧与立场

判定论辩者意图消除的意见分歧必须综合考察其所有论辩话步，必要时还要结合语境知识。在其应答的第一句中，刘为民明确了两点：第一，中国的确对稀土出口采取了管理措施，目的是“保护环境和资源”；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包含“开采、生产和出口”整个环节的“管理措施”，而非单纯的“限制出口”措施。根据WTO法规框架中的GATT第20条g项的规定，中国有权为了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而对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数量采取限制措施，但相关措施不得有国别歧视（杜玉琼，2012）。由此可见，刘为民第一句话是为了表明中国稀土出口管理措施的合规性。在随后的陈述中，刘进一步表明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是合乎情理的（“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尽管面临巨

大环境压力,中国一直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且不影响今后稀土的开发与供应(“中国将继续向国际市场供应稀土”、“中国愿意在寻找开发稀土的替代资源、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根据其应答内容,结合当时中美稀土贸易摩擦的背景,我们认为,刘为民试图消除的是一个未明确表达的意见分歧: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是否正当。对此意见分歧,刘为民持肯定立场。

2. 开始阶段:正反双方与出发点

论辩中的正方一般负有举证责任,他必须用论证维护自己的立场,消除反方的质疑或反对。以此观之,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通常承担正方角色,但由于具体语境的不同,发言人意图劝服的反方却各不相同。结合案件背景可以判断,刘为民应答的潜在反方大致包含两类:第一类是美国政府以及与其共同向WTO提起诉讼的欧盟和日本政府,由于涉及利益取舍,他们对中国的稀土管理措施持不可能改变的反对立场,因此不是刘试图说服的主要反方;第二类是对中国稀土政策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国家、组织和公众。考虑到刘为民的应答内容并没有针对这类受众提出的任何反对立场以及相关论证,我们认为,刘为民意图劝服的反方主要是这类受众中持怀疑态度的那部分人,劝服目的是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出发点是正反双方明确同意或默认的事实或价值判断。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由于无法与反方面对面讨论确定共同出发点,发言人只能假设自己明示或暗含的出发点也是反方认可的。从句①中“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考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表达可以看出,刘为民应答的首要出发点是要保护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从句①中的“相关措施符合世贸规则”和句④中的“并依据世贸规则对稀土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两个表达可以推断,遵守世贸规则也是刘为民应答话语的出发点之一。

3. 论辩阶段:论辩结构与论证图式

为证明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是正当的,刘为民在句①、②、③、④、⑤中都提出了相关论证。其中,句①中的论辩话步主要论证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的合规性,其论证结构可以表示为⁴:

论证1. “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符合世贸规则”

1.1a “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考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1.1a.1a “稀土是一种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

1.1a.1b “开发稀土对环境造成影响”

1.1b “中国对稀土的开采、生产和出口各个环节均实施了管理措施，而不仅仅在出口环节”

参考WTO法规中的GATT第20条g项规定可知，在刘为民看来，1.1a和1.1b是中国有权对某产品出口数量进行管理的合规性特征；如果1.1a和1.1b都成立，那么论证1“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便可成立。可见，这里采用的是征兆型论证图式。

在句②和句③中，刘为民试图论证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合乎情理。他指出，中国“面临巨大环境压力”，原因是“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但仍旧“一直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此外，根据案件背景知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本国稀土开采量几乎为零）可以判知，在句⑤“中方希望其他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也积极开发稀土资源，共同承担全球稀土供应的责任”中，刘为民还预设了一个重要的论辩话步——“其他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没有积极开发稀土资源，没有承担全球稀土供应的责任”，这个话步解释了中国“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的原因。其总体论证结构为：

论证2.（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合乎情理）

2.1a中国（因稀土供应而）“面临巨大环境压力”

2.1a.1 “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

2.1a.1.1（其他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没有积极开发稀土资源，没有承担全球稀土供应的责任）

2.1b “中国一直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

论证2中实际上包含两种论证图式：2.1a.1.1与2.1a.1以及2.1a.1与2.1a之间都存在因果型论证图式，而由2.1b和2.1a推导出2采用的是征兆型论证图式。

在句④和句⑤的论辩话步中，刘为民主要论证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并不影响今后的稀土供应，采用的是因果型论证图式，其论证结构是：

论证3.（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不影响今后稀土开发与供应）

3.1a “今后，中国将继续向国际市场供应稀土”

3.1b（中国）“愿意在寻找开发稀土的替代资源、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

我们认为，在维护“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是正当的”这一未明确表达的隐含立场时，上述四个论证是共同发挥作用的，缺一不可，构成了并列型的复杂

论辩结构。如果把每个论证中的结论视作子立场的话,那么四个论证本身还分别内含多个从属型和并列型论辩结构。概括起来,刘为民应答话语中的整体论辩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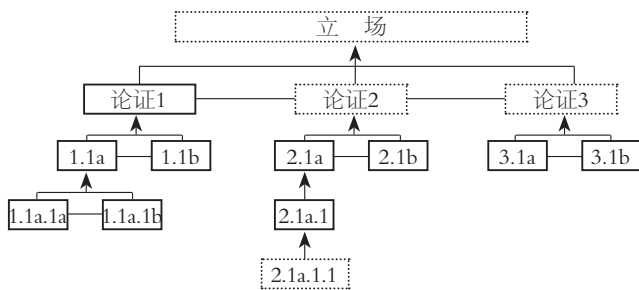


图1：刘为民应答话语的整体论辩结构⁵

4. 结束阶段：结论

通过句④中的“今后,中国将继续……依据世贸规则对稀土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这一话步,刘为民再次肯定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同时暗示他与反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完全得以消除。

(二) 应答话语中的策略操控

总体而言,刘为民应答话语中的策略操控突出体现在意见分歧界定(冲突阶段)、出发点选取(开始阶段)、论证设计(论辩阶段)及结论表述(结束阶段)四个方面。

1. 意见分歧界定：出口“管理”还是出口“限制”？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的任务是透过现场记者向外界发布并维护中国政府愿意透露的官方立场,他们并无义务严格按照记者提问作答。在本个案中,记者提问中包含美方的两个立场:第一是“中方限制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的出口”;第二是“中方限制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的出口损害了美企利益”。显然,记者希望刘为民能够围绕这两个立场消除两个相关意见分歧。但论辩重构的结果显示,刘为民并没有被记者提问所束缚,而是在基本不偏离提问内容的情况下,将“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是否正当”重新界定为意见分歧。与记者意图解决的多重意见分歧相比,刘为民重新界定的单一意见分歧更易被维护。更重要的是,在表达这个意见分歧时,刘为民将记者提问中的核心用词“出口限制”替换成了“出口管理”。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管理”(manage)和“限制”(restrict)两个词都具有较大的语义差别:前者一般指的是依照相关规则进行

决策、计划、组织与实施,强调科学、有序和有效,而后者指的是单纯地缩减和控制出口数量。可见,“管理”一词预设了中国稀土政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而“限制”一词则可能是美方的“有罪推定”,在本案的语境中暗含不符合WTO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因此,通过“管理”这种表达方式,刘为民从论辩开始就赋予了中国稀土政策以正当性。综上,在冲突阶段,刘为民的策略操控既体现在对意见分歧话题的甄选上,还体现在意见分歧的表达方式上。

2. 出发点选取:绕不开的“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出发点的选择直接关系论辩话语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正反双方如果没有任何共同出发点,论辩就无法进行;而将对方并不认可的前提当做出发点则有引发谬误的危险。论辩重构的结果显示,刘为民实际选择了两个重要出发点:“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符合世贸规则”。第一个出发点是国内外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也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核心议题。选择这个出发点可以迎合普遍受众的心理需求,还能为中国管理稀土开发和出口赢得“道德制高点”——与关切环保的中国相比,更加热心稀土经济效益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似乎并不那么“道德”。第二个出发点是WTO所有缔约国的义务,也是美方向WTO提起救济诉讼的出发点之一。选择这个出发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美方之间的“争议空间”。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世贸规则”实际上就必须认可“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WTO协议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宗旨,要求“各成员应合理开发和利用世界资源,保护和维持环境”(杜玉琼,2012)。也就是说,无论美方如何选择都必须接受“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出发点,而如果承认这个出发点,刘为民接下来的论证就有了必要的支撑。

3. 论证设计:合规、合情与勿忧

在论辩阶段,论辩者通常会提出一个或多个论证维护立场,其策略操控通常体现于论证的顺序安排和对论证内容的设计上。如前所述,刘为民先后提出了三个论证,分别对应“合规”(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符合世贸规则)、“合情”(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合乎情理)和“勿忧”(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不影响今后稀土供应)三个话题。因中美稀土贸易摩擦当时即将进入WTO司法程序,第一个论证是包括原诉方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大多数潜在反方最为关切的。将其放在第一序位不但可以充分迎合受众关切,在论证恰当的情况下还能从一开始就给中国立场罩上合规性“光环”。与诉诸“世贸规则”的论证1不同,论证2更倾向于从情感层面劝服潜在反方理解中国的稀土出口管理措施。在论证2中,刘

为民提出了两个比例：36.4%（中国稀土资源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和90%（中国承担的全球稀土供应比例）。在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绝大多数普遍受众看来，这两个比例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说明中国“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理的“必要性”。接下来，刘为民还以语用预设的方式暗示，其他拥有稀土资源的国家（即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并没有积极开发稀土资源。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面临巨大环境压力”的情况下还“一直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两次对比与反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诱发普遍受众对中国的同情，同时把原诉方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向“非道德”的一边。论证3中，刘为民退一步承诺“中国将继续向国际市场供应稀土”并在稀土开发和利用上“与各国加强合作”，此举一方面可以迎合和安抚美国、欧盟、日本等反对中国稀土政策的反方，避免争议继续扩大，另一方面还能在其他潜在受众面前展现中国政府的“大度”和“克制”。

4. 结论表述：留有余地的“有效”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记者通常只有一次提问机会，且不能对发言人的应答再次追问。在这种机构语境的允许下，发言人一般会明示或暗示自己的立场已被成功维护，潜在反方不应再有质疑或反对（虽然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如前所述，为暗示与潜在反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完全消除，刘为民采用了“今后，中国将继续……依据世贸规则对稀土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这一论辩话步（句④）。与相对固定的“世贸规则”相比，“有效的管理”一词更为宽泛，也更难加以界定。可以设想，此场记者会之后，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稀土管理措施难免发生变化⁶，这个语义模糊的词语实际上为中国今后稀土出口政策的变化留下了余地，避免今后在相关问题上受到外界“前后不一”的指责。

（三）应答话语的批判性评价

对照语用论辩学提供的十条批判性讨论规则，同时结合中美稀土贸易摩擦的案件背景，我们认为刘为民的应答对论证图式的把握（规则7）存在显著不足：

首先是对征兆类论证图式使用不当。抽象地看，征兆类论证图式的论证结构可以概括为：

结论：Y于X而言为真

因为：Z于X而言为真（前提1）

且：Z是Y的特征（前提2）

一般而言，论辩者只明确表达结论和前提1而略去前提2，因为在特定的语境

下,受众通常可以“自觉补足”前提2。为评价征兆型论证图式是否被恰当使用,研究者可以提出三个批判性问题:(1)Z真是Y的特征吗?(2)非Y事物是否有可能也有Z特征?(3)Y是否还存在非Z特征(van Eemeren et al., 2002: 97-98)?

论辩重构结果显示,刘为民在论证1中采用了典型的征兆型论证图式,其推理结构为:

结论:【符合世贸规则】(Y)于【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X)而言为真

因为:【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考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且对稀土的开采、生产和出口各个环节均实施了管理措施】(Z)于【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管理措施】(X)而言为真

且:【基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考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且对稀土的开采、生产和出口各个环节均实施了管理措施】(Z)是【符合世贸规则】(Y)的特征

根据WTO法规框架中的GATT第20条g项的规定可以发现,刘为民在使用征兆型论证图式时忽略了第三个批判性问题——除了他列举的几个重要特征之外,对稀土实施出口管理措施符合相关世贸规定实际上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关键特征:不得带有国别歧视性,即对稀土的出口管理措施要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梁咏, 2011)。由于缺失与这一关键特征密切相关的论辩话步,论证1的合理性显得不那么充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WTO调查阶段,美国和WTO专家组正是在这一点上向中国发难的。

其次是对因果型论证图式的使用不当。因果型论证图式的抽象推理结构一般可以表示为:

结论:Y于X而言为真

因为:Z于X而言为真(前提1)

且:Z导致Y(前提2)

与征兆型论证图式类似,在因果型论证图式中,论辩者通常也会省略前提2并希望受众能依据语境知识而自觉补上。在评价征兆型论证图式是否被恰当使用时,研究者可以提出的批判性问题是:Z总是导致Y吗(van Eemeren et al., 2002:101)?

在论证2中,为论证2.1a(中国因稀土供应而面临巨大环境压力)的合理性,刘为民提出了2.1a.1(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其论辩结构可以概括为:

结论:【面临巨大环境压力】(Y)于【中国】(X)而言为真

因为：【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Z）于【中国】（X）而言为真

且：【稀土资源占全球总量36.4%，但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供应】（Z）导致【面临巨大环境压力】（Y）

如前所述，在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大多数普遍受众看来，36.4%的稀土保有量却承担90%的稀土供应这一数字事实可能足以说明中国“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但这个“诉诸同情”的论证却可能经不起批判性问题的检视——稀土开采造成环境压力的原因很多，其中既包括过量开采，也包括开采模式、技术与方法不当（贾根良，刘琳，2011）。只有在排除开采模式、技术与方法不当这些因素，或者指出中国在开采模式、技术与方法上的无奈，论证2.1a才能更为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对辩论话语的批判性评价主要基于其合理程度，关注的是该辩论话语能否经得起理性受众（即只接受合理论证的受众）的批判性检视。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刘为民答记者问进行批判性评价并指出其谬误的同时，我们并不否定该话语可能具有的修辞效果。

五、研究启示

如前所述，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根本目的是说服国际受众认可中国政府的立场或做法，如何增强其应答说服力是研究的重点。在国内话语研究和传播学领域，话语的说服力研究主要基于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说服技巧也常常被简化为一系列修辞技巧（或者说修辞性论证），如诉诸人格、诉诸情感、诉诸权威、转移焦点、模糊处理等等。但是，包括语用论辩学在内的大部分论辩学理论都认为，修辞技巧本身并不当然地具有说服力，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的修辞技巧只能被视作谬误。比如，刘为民在论证2.1a“中国因稀土供应而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中使用的诉诸同情论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技巧或策略，因为它能在心理层面激起受众对弱势方本能的同情，进而促使受众认可相关论证。而在论辩学看来，该论证在本案的语境下违反了“恰当使用论证图式”这一批判性讨论规则，经不起理性受众的批判性检视，因此只是说服力较弱的谬误。那么，究竟应该从何种视角分析和评价发言人的应答话语并提出相关建议？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是否将发言人应答的潜在受众视作理性受众。

必须承认，外交部发言人的潜在受众并不都是理性的，其中既有主观上不愿意理性判断的受众（尤其是因意识形态差异或利益争夺而对中国立场持反对态度的外国

政府、组织或个人），也有客观上无法理性判断的受众（特别是不具备理性思考能力或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国际公众）。但是，发言人和研究者并不能因此忽略理性受众的真实存在，也不应低估国际传媒理性分析与评判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的“喉舌”和政府信息的“第一把关人”（赵琳，2009），外交部发言人有责任通过合理应答帮助中国构建起理性国家形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将发言人应答的潜在受众视作理性受众。不过，对刘为民应答话语的策略操控分析显示，在不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修辞技巧的确是提升应答说服力的有效途径。从这点看来，对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分析、评价以及改进建议不但要秉持论辩合理性原则，还应考虑修辞有效性的问题。有机融合论辩学和修辞学两大理论视角的语用论辩学为此提供了一条理想的研究路径。该路径由论辩话语重构、策略操控分析和批判性评价三个有机相连的环节组成。本文的个案分析表明，这三个研究环节实际上都是围绕论辩话语中的意见分歧、正反双方、出发点、论辩结构、论证图式和结论等六个核心要素展开的，表1是我们对三个研究环节核心研究内容的梳理与归纳。对照表1，研究者可以首先采用定性分析思路全面、深入剖析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若干个案，从中发现发言人在冲突、开始、论辩或结束四个阶段分别可能采用的论辩策略，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思路揭示这些论辩策略在大量应答话语语料中的实际使用情况，最后结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机构语境为发言人合理有效使用这些论辩策略提供参考性建议。

教育部语信司前司长李宇明（2012）先生在谈到政府新闻发言人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百姓看政府，一看他怎么做，二是听他怎么说”。同样道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部分取决于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说服力。因此，无论是从实际需要还是从理论建设角度来看，对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论辩视角在相关研究中的必要性，并初步探讨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语用论辩学研究路径。根据上文提到的研究思路，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继续沿着这一路径，通过更多个案研究深入分析和评价外交部发言人在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阶段中采用的典型论辩策略，如重新界定意见分歧（冲突阶段）、扩大一致空间（开始阶段）、指出对方谬误（论辩阶段）、非绝对化结论（结束阶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具有独特的机构语境和问答惯例，这些惯例制约着外交部发言人的应答话语，理应成为评价发言人应答话语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挖掘这些惯例并将其与语用论辩学的批判性讨论规则进行比较

和融合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

(责任编辑:李慧娟)

表1: 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语用论辩路径

发言人应答话语的批判性讨论阶段	发言人应答话语中的核心论辩要素	研究环节 1: 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论辩重构	研究环节 2: 发言人应答话语中的策略操控分析	研究环节 3: 发言人应答话语的批判性评价
冲突阶段	1. 意见分歧	1. 发言人在其应答话语中界定了什么意见分歧? 2. 对此意见分歧, 发言人持何立场?	1. 发言人在界定意见分歧和立场时选取了哪些潜在话题? 迎合了哪些受众需求? 采用了怎样的表达手段? 2. 发言人界定的意见分歧和立场对其论辩过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发言人不得阻止对方自由提出立场, 也不能阻止对方质疑自己的立场; 2. 发言人对另一方立场的攻击必须与另一方确实提出的立场相关。
开始阶段	1. 正反双方 2. 出发点	1. 发言人将哪些受众设定为自己应答话语的主要反方? 2. 发言人应答话语中设定了哪些重要的(明示或暗示)的出发点?	1. 发言人对主要反方的设定可能对其论辩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2. 发言人是如何通过对潜在话题、受众需求以及表达手段的综合选择设定出发点的? 3. 该出发点对其论辩过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发言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2. 发言人不能错误地把前提当作共同出发点, 也不能否认作为共同出发点的前提。
论辩阶段	1. 论辩结构 2. 论证图式	1. 为维护己方立场, 发言人应答话语中使用了哪些论证, 这些论证组成了怎样的论辩结构(单一、多重、并列、从属)? 2. 每个论证分别使用了哪些论证图式(征兆、类比、因果)?	1. 发言人在提出论证并组织论辩结构时选取了哪些潜在话题? 迎合了哪些受众需求? 采用了怎样的表达手段? 2. 发言人采用的论辩结构对其论辩过程有何影响? 3. 发言人提出的具体论证及论证图式对其论辩过程有何影响?	1. 发言人只有提出与立场相关的论证时, 该立场才能得以维护; 2. 发言人不得错误地将另一方未表达的事物认作前提, 也不能否认对方的未表达前提; 3. 发言人对立场的维护如果没有借助正确的论证图式, 或者没有恰当使用论证图式, 那么就认为该立场得到了决定性维护; 4. 发言人应答中的推理必须逻辑上有效(符合逻辑)。
结束阶段	1. 结论	1. 发言人界定的意见分歧是否得以消除?	1、发言人是如何通过潜在话题、受众需求以及表达手段的综合选择表明意见分歧已经得以消除的?	1. 若维护立场失败, 发言人必须收回其立场, 若维护成功则对方必须收回质疑或反对立场。

注释 [Notes]

1. 按照论证组合方式的不同, 辩论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型(由一个单独论证支撑立场)、多重型(由多个论证组成且每个论证独立支撑立场)、并列型(由多个论证组成且合力支撑立场)和从属型(由多个论证组成, 论证与论证之间存在层层支撑的关系)。
2. 论证图式(也称论证型式)指的是论证中能够将前提的合理性推移至立场的抽象推理方式。常见的论证图式主要包括三类: 征兆型论证图式(即根据某一事物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推导出某一立场)、类比型论证图式(根据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可比性推导出某一立场)和因果型论证图式(根据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推导出某一立场)。
3. 记者提问以及刘为民的应答原文参见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913591.shtml。
4. “1、2、3……”指的是论证中的结论; “1.1、1.2、1.3……”、“1.1.1、1.1.2、1.1.3……”指的是可以单独维护上一级结论的若干前提; “1.1a、1.1b、1.1c……”、“1.1.1a、1.1.1b、1.1.1c……”指的是论证中合力维护上一级结论的若干前提; 括号中为刘为民未明确表达, 但根据上下文以及语境可以补充出来的辩论话步; 引号中为刘为民的原话。
5. 实线框内为刘为民明确表达的辩论话步, 虚线框内为刘为民未明确表达的辩论话步。
6. 2015年1月5日, 中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 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可申领出口许可证。参见2015年1月21日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答记者问: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50121.shtml>。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窦卫霖 (2011). 《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Dou, Weilin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US governmental discours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杜玉琼 (2012). 中国稀土出口管理的合法性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 91-94.
- [Du, Yuqiong (2012). Analyzing the legality of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exports of rare earth to the tombarthite export,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9), 91-94.]
- 官科 (2013). 基于西方新修辞学的新闻发言人话语建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4), 153-156.
- [Guan, Ke (2013). Construction of press spokesperson discourse: an approach of western new rhetoric,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6(4), 153-156.]
- 贾根良, 刘琳 (2011). 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 (4), 136-144.

- [Jia Genliang & Liu, Lin (2011). Rare-earth issue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economic history and an analysi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8(4), 136-144.]
- 洪岗, 陈乾峰 (2011). 中美新闻发言人拒绝策略对比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 43 (2), 209-219.
- [Hong, Gang & Chen, Qianfeng (2011).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refusal strategies employed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spokesperson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3(2), 209-219.]
- 胡庚申, 王静 (2001). 中外记者招待会用语特征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6 (3), 83-88.
- [Hu, Gengshen & Jing, Wang (2001). Th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use in Sino-foreign press conference.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6(3), 83-88]
- 李朝辉 (2012). 积极应对稀土贸易纠纷. 《中国贸易救济》, 2012, (5), 8.
- [Li, Chaohui (2012). Coping with tombarthite trade dispute actively. *Trade Remedy*, 2012, (5), 8.]
- 李宇明 (2010). 应重视新闻发言人语言研究——在“新闻发言人语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 (1), 26-27.
- [Li, Yuming (2010).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spokespersons' spokesmens' language use: a speech on the research colloquium of spokespersons' language use. *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1(1), 26-27]
- 梁咏 (2011). WTO框架下稀土纠纷可能引致之争端与解决. 《太平洋学报》, 19 (5), 60-68.
- [Liang, Yong (2011). Trade dispute triggered by rare earth and its resolution under the WTO. *Pacific Journal*, 19(5), 60-68.].
- 涂光晋, 宫贺 (2009). 中美官方西藏主题新闻发布的政治修辞分析. 《国际新闻界》, (8), 32-37.
- [Tu, Guangjin & He, Gong (2009). A political rhetoric analysis of official press release on Tibet in China and Americ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8), 32-37.]
- 吴鹏, 熊明辉 (2015). 策略操控: 语用论辩学之修辞拓展.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2 (3), 64-69.
- [Wu, Peng & Minghui, Xiong (2015). Strategic Maneuvering: a rhetorical extension of Pragma-Dialectics.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2 (3), 64-69]
- 赵琳 (2009). 政府新闻发言人语言传播初探. 《新闻与传播研究》, 16 (4): 85-91.
- [Zhao Lin (2009). A study of government spokespersons' oral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6(4):85-91]

- van Eemeren, F. H., Grootendorst, R. & Snoeck Henkemans, A. F. (2002). *Argument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presentation*, Mahwah, NJ: Routledge/Lawrence Erlbaum.
- van Eemeren, F. H. & Grootendorst, R. (2004).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Eemeren, F. H. (2010).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extend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an Eemeren, F. H., Jackson, S. & Jacobs, S. (2011). *Argumentation*.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Singapore: Sage.

补充信息说明

本刊2015年第6期所发陈阳《“主动的受众”之再思考：美剧与当代中国青年的国族意识》一文系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美剧的中国受众之研究”成果之一。

本刊编辑部